

中国的西方哲学的任务和问题

赵敦华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的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和研究在改革开放前后广泛翻译和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也面临新的问题。我在回顾即有成就的同时，对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任务有一些思考。以下拟从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观点，就教于同行和方家。

一 西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特点是用教科书界定学科体系。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1]虽然“西方哲学史”这门课最迟在 1917 年就已经开始了，胡适、张颐、汤用彤、贺麟、陈康、郑昕、任华等著名教授都讲授过这门课，但解放前北京大学使用的是梯利的《哲学史》英文教材，20 世纪 50 年代使用的教材是苏联人写的《哲学史》多卷本。建国以后出现中国人自己写的西方哲学教科书，最早可追溯到 1957 年出版的《哲学史简编》，其中的西方哲学史部分由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等执笔。这部分内容后经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改写成《欧洲哲学史简编》，于 1972 年出版。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集体编写的《欧洲哲学史》、陈修斋和杨祖陶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稿》，全面总结了解放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成果。80 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西方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和空前进展，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苗力田、李毓章等编写的《西方哲学史新编》，冒从虎等编写的《欧洲哲学通史》，朱德生、李真编写的《简明欧洲哲学史》，特别是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夏基松的《现代西方哲学》等一批优秀的西方哲学教材奠定了“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两大学科体系的框架和基本内容。

新世纪出版的一些教科书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更新换代的标志性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两个特点。一是西方哲学研究者通力合作，依托国家和省部级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写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八卷本《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体现了中国学者的集体智慧，堪称标志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整体实力的“学术航母”。二是适应培养哲学思维、启迪批判创新的教育改革的需要，如韩震主编的《西方哲学概论》，邓晓芒、赵林编写的《西方哲学史》，张志伟等编写的《西方哲学史》，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等，围绕哲学问题，在哲学论证方面下工夫，虽然篇幅不大，但起到了举一反三、启发智慧的效果。

通过西方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学科体系，把西方哲学的思想转化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组成部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和加强这一独特体系”。有些问题不是中国研究者所特有的，西方哲学史家也在继续研究和争论这些问题。比如，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这“四大块”是如何过渡和衔接的？西方哲学的逻辑线索是线性发展、螺旋上升，还是交叉重叠？现代哲学开始于黑格尔之后还是 20 世纪之初？哲学史分期与世界史分期有何关系？可以设

想和预见：对这些“宏大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对各个时期西方哲学的体系和具体哲学思想的解释视角、方法和结论产生重要影响，包含着很多潜在的创新点，值得我们下力气研究。

二 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

西方哲学史教材与西方最新哲学成果的翻译和引进相结合、教科书与资料选辑相结合，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教学的主要机制。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译的西方哲学原著资料四本，即《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哺育了整整一代哲学工作者。80年代编译的两卷本《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已是“经久耐用”的教学资料。现在，西方哲学家的主要著作都已经有了中译本，国外流行教科书大部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或原版引进。西方哲学的翻译工作正在向系统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翻译“全集”蔚然成风，主要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维特根斯坦、奎因、卢梭、黑格尔、尼采、杜威、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人的“全集”已经或正在陆续出版。西方哲学原著翻译的积累和更新，为提升西方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提供了坚实而宽厚的学理基础。

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语言转化问题，围绕着中译哲学术语的争议的背后是深层次的不同的哲学理解。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意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功夫，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的比较。只有文理通顺的中西互译，才能推动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虽然陈康早有“要使研究希腊的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憾”的理想，但“现代汉语对西方哲学的作用和意义”的问题在中国仍无共识。一些专业研究者认为，西方哲学既然是国际学问，中国学者就不必自搞一套，而要与世界接轨；他们主张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都需要从原文原著出发，不能以英文译本和文献为校准，更不能依赖中文翻译。我所持的基本观点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中文而不是西文。虽然原文原著的教学和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但当西方哲学的学理在研究主体、接受对象和学术环境等条件从西方转移到中国，那么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用现代汉语思考西方哲学，便变成了中国当代哲学的时代精神和研究路径。国人总是根据政治形势、社会改革以及文化建设的需要，有选择而不是盲目地、有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地翻译引进、研究、传播和吸收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著作的中译不能“雅”而无“信”，也不能“信”而不“达”。不同语系之间的“不可译原理”不符合事实，但要完全符合“原意”也是空洞的苛求。即使西文的术语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译法，那么中译应遵从哪一种“原意”呢？西方哲学的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为理解而翻译”的榜样。新一代的翻译有两种貌似对立的想象：一是按照词典、没有理解的“硬译”，闹出许多笑话；二是按照西人的某一派主张或自己个人的理解，颠覆前人创立、现已约定俗成的译法。不是说约定俗成必定正确，不可继续探究和修改，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哪种译法最正确，而是改善已有的译法是否必要，有何合理性，有何得失。实际上，任何译法都有缺陷，没有“最正确”，只有“较合理”，很多疑难只有通过注疏才能表述其在原著上下文中的意义。在西方哲学翻译集成化的形势下，我们应注重两条：一是翻译的质量和注释，二是翻译的推广和普及。后者尤为重要，少数专家直接阅读原文原著，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主要是供非专业人士甚至民众看的，因此应该尽可能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约定俗成的语言，按照汉语的思维和表达习惯来翻译和解释西方哲学原著。

三 “中西马”哲学对话的中介

当前，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开始得到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中很多涉及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和方法，不可避免要突破哲学八个二级学科建制的壁垒，由此引起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设置是否合理”

的议论。八个哲学二级学科是中国特色，也是历史的产物，曾经起到推动哲学研究从泛化的“普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历史作用。但只在哲学二级学科内强调专业化，则产生了以邻为壑、阻隔交流的危险，致使哲学问题无法深入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二级学科领域中的主干学科，其余五个二级学科内部各有中、西、马部分，比如，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西方伦理学史，等等。哲学二级学科交流的关键是“中西马”的对话交流，哲学界“中西马”对话交流的呼声很高，会议不少。各学科的学者认识到，这并不是要求一个哲学工作者精通“中西马”的全部知识，而是在研究本专业具体问题时应有其他学科视野，比如，研究中国哲学的某一概念或观点，要知道与此相关的西方哲学观点是什么。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地在比较宽广、甚至跨学科的视野中提出和解决问题，不但没有削弱专业化，而且在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引起更多专家的共鸣。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近十年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虽自某个二级学科内开始，但涉及的问题却与“中西马”三者关联，其他学科的学者也积极参与，形成了有利于拓宽视野、深化问题、更新方法的观点和共识。

“中西马”的对话不是“三国演义”式的混战，而需要两两对话式的深入比较。比较涉及“中-西”、“西-马”和“中-马”这三个对子。从哲学界现状来看，前两个对子硕果较多，而“中-马”的比较相对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古代中国哲学缺乏共时性，只能进行历时性的同异比较，容易出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的“庄子悖论”。在“中西马”哲学的共时性对话交流中，“西”是“中”和“马”的中介。辩证法的中介使得没有联系的事物发生联系，由非此即彼过渡到亦此亦彼。通过“中-西”和“西-马”的共时性对话，可以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上促成“中-马”的实质性对话，从而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合奠定哲学理论基础。

西方哲学既然要承担“中西马”哲学的中介任务，就需要用更高的要求、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方法来发展自身。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摒弃了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阵”的定义，这并不意味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不需要批判精神。西方哲学是充满批判的思想英雄们的较量，不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西方哲学便不能掌握其精髓所在。但是，目前的西方哲学领域，大部分人还是采取哲学史家的态度和方法，缺少中国式批判和理论创新的自觉。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了的肯定和有保留的否定之间的张力。我们应该永远告别改革开放之前那种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论的武断粗暴做法，但现在没有任何批判、完全肯定、一味转述的做法也不可取，这两个极端都是缺乏自信、没有自觉的表现。近30年多来，中国人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和正面评价来引进西方哲学。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二战”前后西方哲学消极、负面的社会影响，引以为戒，不能盲目转述和效仿。

我们不但需要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用发展了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努力把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建设面向中国、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哲学。

四 西方哲学的大众化^[2]

哲学可以大众化吗？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大众化比西方哲学的大众化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但有哲学之实，那些现在被称为哲学家的古代士人大多出身于耕读传家的乡绅，他们的道德文章虽然有些超脱清谈，但总以民情国事为本，可谓识字知书达礼之人的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是众多西学中不起眼的，在刚发达之时又被讥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但经过大众化之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曾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放在案头，蒋介石多次在

有台湾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这样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3]。

西方哲学可以大众化吗？答案是肯定的。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大众化的人，以致他的死不但在当时雅典是重要的公共事件，而且成为西方思想史的里程碑。西方哲学大众化的最近事实是启蒙时代的哲学。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在世界历史的这一伟大时代，只有日耳曼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相互反对的”^[4]。尽管两国启蒙思想不同，但社会影响的规模和程度相当。法国的启蒙哲学家的学说控制了舆论民情，导致了大革命的发生。摆放法兰西民族英雄灵柩的先贤祠门口两端是卢梭和伏尔泰，以彰显启蒙哲学家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肇始之功，以及法国启蒙哲学家对法国的贡献。马克思说：“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5]，那是指在民族统一之前，德国哲学首先统一了人民的思想。恩格斯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6]，这是说马克思主义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的中介首先在德国工人中间传播开来。

对中国人而言，“西方哲学可以大众化吗？”这一问题尤为尖锐，更难解决，我想原因有三。

首先，西方哲学在20世纪面临危机，遭遇了“形而上学的颠覆”，现在只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通专业。哲学家过去的公众形象是智者和贤人，现在却是这样一类专业人员：他们使用专业术语，乐而不疲地争论只有本派别或圈内人士才感兴趣的问题，局外人却不知所云。哲学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少，哲学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小，于是有些西方哲学家现在把“公共哲学”当作哲学的出路。

其次，哲学工作者中有一种抵制大众化的普遍心态，往往用“无用之大用”的辩解或“精神贵族”的自诩为哲学危机解围，当不能被公众所理解时，就发出“实践哲学”、“心性之学”、“生活世界”、“修齐治平”、“终极关怀”、“功夫之学”等此起彼伏的呼声，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些口号的背后依旧是抽象学说或历史概述。

再次，中西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差异使得西方哲学很难在中国用中文大众化。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似乎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考证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恢复中文的“古语系统”就不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读“原汁原味”的外文版就不能理解希腊、罗马、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外国哲学。“信达雅”的翻译和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本是中外哲学交流和大众化的媒介，现在却被视为学习和研究哲学的障碍。国内外哲学界总有一些人，非要把哲学道理讲得让人听不懂，以显示学问的高深奥妙；或讲得使人似懂非懂，让听众自愧不如，甘拜大师。鲁迅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澈。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用现代汉语讲哲学，讲得清澈见底未必浅薄；如果半文半白或中西夹杂地讲哲学，讲成“烂泥塘的”肯定是故作玄虚。当代中国哲学更应提倡大众化，西方哲学的大众化在中国尤其任重而道远。

注 释

[1]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上海书店，1945，第26页。

[2] 本节是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3日发表的《中国大众的现代西方哲学》一文的摘录和修改。

[3] 李今山主编：《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1981-200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第180-181页。

[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24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3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贾红莲